

##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理论文章选登 (南平市委宣传部 南平市社科联)

# 书院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朱清

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全球文明倡议”的积极呼应。近年来,朱子学界和书院界十分关注推进朱子学与全球文明对话,包括进一步认识朱子学在中国书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朱子推行“书院理学一体化”的跨时空价值。这也涉及书院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关系中“侨”的因素。发挥书院的作用,正是“以侨为桥”助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题中之义。

### 书院发展与中华文化密切关联

书院发端于中国唐代,是一种承载中华文化基因的教育组织形式,至今已跨越千年。早期书院多属民办“有教无类”,是从东汉儒者研习“五经”的精舍演变而来,践行孔子“天下为公”“仁政礼治”的主张。南宋朱熹,面对“国破世衰”和儒学式微,奋起救亡,“为往圣继绝学”,阐发孔孟义理,创立理学体系。朱熹集注“四书”,将书院建设与理学构建深度融合,以“民为邦本”“忠孝廉节”立德树人,“为万世开太平”。书院成为理学集大成和中华复兴的重要载体。

唐宋元明清五朝,基于官学融入及至官办民办交织,中国各地先后创办书院达7500余所。书院浸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藏书、出版、建筑等各个领域,培植国人养成“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伦常观念、话语系统、价值判断和精神支撑。古代书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中国的国家一统,也随着孔朱学说誉为“东方文明”而流布全球。

自明代起,大批中国书院移植海外,其中两大原因,一是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扩大,一是数千万中国人迁徙世界各地。书院在东亚、东南亚及欧美地区纷纷落

地生根,成为中外文化交汇和人民交往的纽带;尤其在朝鲜、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家的华侨华人聚居地影响最盛,给世界文明美美与共增添新的景象。

史载,早在1534年,古朝鲜李氏王朝的丰基郡守周世鹏,即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为遵循,创办了朝鲜半岛的第一所书院——白云洞书院。李朝时期的朝鲜书院及书堂多达900余所,崇奉朱子学的书院占比最大,地位最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朱子学为“后孔主义”,认为其“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影响了世界很大一部分”,并将“与朱子理学相关的书院遗址”作为武夷山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 中国书院如何返本开新走向世界

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不衰,书院命运与之亦同。清末,帝制落幕科举废止,“书院改学堂”成为古代书院生于封建社会的宿命,但书院精神的核心价值并未湮灭。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迈上新征程,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聚焦朱子理学的研究和转化创新,多次考察书院。他伫立“朱熹园”即当年朱熹创办的书院——武夷精舍,强调“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书院精神焕发重光。

新时代“书院热”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潮中涌动兴起,迸发活力。目前,全国已修复和新建书院超过4000所,一大批在中华文明史上影响大、贡献大的古代书院得到精心保护与改扩建,新型民办书院亦如

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融汇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书院复兴聚势赋能。

2016年9月,中美人文交流与合作项目——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落成,30多个国家数百名青年才俊作为首批学员入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希望苏世民书院成为一个培养世界优秀人才的国际平台,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积极努力。”2017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厦门筼筮书院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首场峰会,使书院亮相于重大主场外交舞台。

### 关于书院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作用

——依托国际儒学联合会、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等面向全球的学术文化组织,借助各种优势资源和有利条件,进一步探索书院建设中的多方协同、形成合力。组织社会科学界、理论界深度挖掘朱熹推行理学书院一体化与书院制度化的丰富内涵,为书院在全球文明对话中提供“具有当代启示意义”的学术成果。各级党委政府在“书院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相关理论研究方面加大人力物力的支持力度。

——总结提升运用书院平台助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经验做法,在全国遴选、布局一批研学活动卓有成效的书院作为高质量对话窗口,提出同世界文明美美与共的“中国方案”;适时举办以“书院与全球文明”为主题的国际性论坛或对话交流活动。尼山圣源书院已举办多届“世界文明论坛”的经验可供借鉴。

——在知名书院定期举办国际性中华文化研修班,组织高素质讲师系统介绍中华文化通识内容及其普世价值;邀请海外学者到中国书院参加“人类命运共

同体”相关话题“会讲”,逐步实现中外学者会讲活动常态化。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吸引海外人士来中国大陆,参加以知名书院为目的地的“中华文化·书院之旅”等游学活动。鼓励、资助或有计划地组织知名书院的山长、院长、讲师等相关人员赴海外访学,与当地书院、文化团体共同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增进文明成果共创共享。

——通过海内外新闻界的交流和融媒体渠道,推介和传播中国书院发展史及其书院中的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展示中外文化交流合作成果,拓宽对话空间,打造亮眼品牌。如2021年5月,“中国有约·遇见福建”国际媒体主题采访团造访武夷精舍,拉美籍记者感言:“朱子关于‘民为邦本’的论述最令人震撼,关注人民福祉的思想在中国有悠久的传承。”中外记者用自己的报道,将中华文化的精华和中国书院精神传递给世界。

——鼓励各地书院以宗亲、侨亲为桥梁,同海外华侨华人创办的书院及华文学校、华文社等建立联谊关系,促进以孔孟儒学、朱子理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球炎黄子孙中世代相传。2024年10月,中国侨联在考亭书院设立“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凸显了书院助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侨的契合力”。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国书院,既是中华文脉的传承者,也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践行者和推动者。要将书院更好地融入世界,持续生辉,让中华文化的思想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系中国朱子学会顾问,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客座教授)

# 福建南平,海瑞仕途第一站

□何杰华

明代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中举后,参加了嘉靖二十九年、三十二年两次会试,均名落孙山。二次落第之后,海瑞接受谒选,于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被授任福建南平儒学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他的仕途由此正式开启。

### 为什么是南平教谕?

明代科举体系中,举人虽具备入仕资格,但晋升路径与任职层级均受严格限制。两次会试落榜后,举人海瑞有以下几条路可选:一是继续参加会试,直至中第入仕;二是接受吏部谒选,出任儒学教官一类低等职官;三是进入国子监备考或等缺;也可选择就此放弃,著书立说或是在非官方学校充任教书先生,即自谋出路。洪武十八年定下的“以会试下第举人俱授学正、教谕”政策,让决定不再参加会试的海瑞只能选择接受“学正、教谕”这样的限定教职。

海瑞出任县学教谕之地是福建南平而非别处,与明代对教官任职地点的限制有关。洪武初年,府、州、县各级儒学始建,地方儒学制度尚未建立完备,教官任职多采取“本地任教”政策。洪武四年后,考虑到回避原则,教官与其他官员任职均采取“南北互调”制。洪武十三年,“南北互调”之法有了更为细致的安排:“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有司用之,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于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有司用之,广西、广东、福建之人亦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有司用之。”自此之后,教官的任用也渐循此例。不过,这种做法在施行后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其一,教官上任路途遥远,由此所带来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成本巨大,且无可避免地导致安全风险高企;其二,南北风土人情差异巨大,语言不通,给教官的正常生活及教学工作的开展带来巨大的麻烦。因此,洪武三十一年,“南北互调”的教官任职地回避制度改为了“就近非本

省”任职。

由是,根据嘉靖朝的规定,举人海瑞便只能在广东邻省就职。查万历《延平府志》,统计明代隆庆朝之前(“就近非本省”执行期内)南平县学教谕籍贯,可知25位历代教谕中有7人为广东籍,与浙江籍并列居首。再看万历《琼州府志》中琼山籍举人出任教谕就任职地的记载,32人中有7人任福建各学教谕。这两组数据印证了“就近非本省”政策下广东举子赴闽任职的普遍性。海瑞出任南平教谕正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若仅以客观限制论,海瑞的选择尚显被动,但其家族与福建的历史渊源,其本人“学为圣贤”的人生理想的双重作用,则使这份被动的选择有了主动认同的意味,让“不得不”的选择转变为了“我愿意”的接受。

在海瑞赴任南平前,琼州海氏已与福建形成深厚关联。海瑞伯父海澄成化十一年(1475)登进士后曾任建宁府建阳县知县。据《八闽通志》记载,在建阳知县任上,海澄先后主持重建了莒口桥、同文桥、兴文桥、庆祥桥、会通桥、新兴桥、瀛洲桥等,曾为莒口镇庄书院前二坊分别匾名“世家先哲”“光祿”,还为建阳县公署增建德楼。由于在建阳任上表现出色,成化十八年,海澄被擢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

成化二十年,海瑞的祖父海宽又到福建,任松溪知县。

建阳、松溪均属明代建宁府管辖,与海瑞任职的延平府南平毗邻,今同属南平市行政区划。由此,海瑞虽无主动选择任职地之权,但福建作为“亲情牵绊之地”,且与海南“语言相近、风土略同”,使其对赴南平任职产生了天然的心理认同。

此外,也与海瑞本人的圣贤理想有关。“学为圣贤”是海瑞自幼确立的人生理想,认定科举仅是入仕途径,而非求学终极目标。教谕一职虽为基层教职,却为他提供了“以教践行”的平台——通过培育学子、传播圣

道实现“圣贤理想”。

### 任上的作为与成就

明朝初年,朝廷诏令明确规定了各府、州、县儒学俱设教官,其中每县设有教谕一人、训导两人。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在《敕谕》中明确了教职人员的职责:“天下府、州、县学官总理事务,其训导专教生徒,毋令同署公文,以妨讲授尔。”南平教谕海瑞的职责是总理县学,另有两名训导专教生徒。

针对南平“教弛日久,土风不端”的现状,海瑞上任后便订立学规,尝试从根本上扭转学风:一是以朱熹《白鹿洞五经》为总纲,以朱子弟子辅广总结的《朱子读书六法》为指南,为学子明确治学目标,规范治学路径,确立行为准则;二是摘录“乡原之辨”“孟子不见诸侯”等儒家经典命题引发思辨,“以发其真心,作其浩气”。

在此基础上,海瑞制定《教约》十六条,细化行为规范:针对“虚报年龄、冒名顶籍”问题,要求诸生五日内“从实填报年甲籍贯,更造册籍”;针对“把持衙门、攻讦他人”的陋习,规定“优免诉告等事必由本学申请,否则不贷”;针对作文“抄袭无补”问题,提出“举范文供观摩,违规者加补戒”,同时确立月考、朔望讲书等制度,并推行分层教学——对“经史稍通者”讲授“边防、水利”等经世之学,由海瑞本人每月亲自策试。这套兼具思想引导与行为约束的教规体系推行后,南平县学“学风为之一振”。

海瑞还作《规士文》,为南平学子阐释“士之责任”:指出褊衫“玉色表德、青色戒奢”,象征“德行为先、朴素守礼”;“四方平定巾”则隐喻“士以安民为任”。他以“百姓见秀才而敛容”的社会现象,强调“士当自重”,批判“造谣诽谤、结党乱纪”等失德行为,呼吁学子“以礼法自律,成浩然之气”。

“教官不拜”是海瑞南平任职期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据《明史·海瑞传》载,时有御史巡按视察学官,“属

吏威伏谒,瑞独长揖”,直言“台谒当以属礼,此堂师长教士地,不当屈”。当时两名训导左右跪伏,海瑞居中挺立,形似笔架,故获“海笔架”之称。新中国成立前《丘海合集》进一步补充事件细节:海瑞初拒拜郡守诸大夫,遭呵斥“安所得山字笔架来”,遂请致仕;太守醒悟后愧悔挽留,福建学宪朱镇山亦“再三慰留,聘赴正学书院修书”。后巡按御史再至,海瑞仍“长揖不跪”,令分守道惊叹“世有若教官耶”。

此事件并非简单的“抗礼”,而是海瑞教育理念的实践,更是为南平学子树立榜样——他曾在《教约》中要求学子遵守“拜谒之礼”,理当以身作则;他在事后写给朱镇山的《申朱提学道教条》中强调《宪纲》规定“教官生员迎送参谒有定制,盖以作士气”,声明“不拜”的行为是“恪守祖制、维护师道”。最终,其主张获上级认可,所定教规亦通过“公文批示”获得官方认证,其本人也被“交相举荐”出任知县。

海瑞在南平任上,并未将自己困于教谕之“总理学事”职责之中,而是同时将目光投射至地方政务。针对闽中驿递“关文冗杂、疲惫不堪”的问题,向上级建议推行“裁汰冗杂、循序渐进”的驿传治理策略。这一建言既体现了海瑞对民生的关切,也使其“务实变通”的施政风格得以显现。

海瑞的南平实践成效显著,不仅扭转了当地学风,更培育出一批优秀人才。据民国《南平志》载,南平学子林有梧“受海瑞奖誉”,后历任博白县令、姚州太守等职。在任和去职,林有梧始终能“清介自矢,善政具举”,去世时与其恩师一样“囊无长物”;另一位学子黄仁辅,受海瑞影响“以礼法自律”,历任新淦教谕、感恩教谕、国子监助教,任内“复祖席序旧规,不责贤于拜见之间”,成为“有口皆碑”的学官。林有梧和黄仁辅的为官风格与海瑞一脉相承,印证了其在南平教育实践的成功。

(作者系海南省典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 文明用语三春暖 礼貌待人天地宽

